

第五屆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
2004年9月8日至9日

省區改劃與省籍情結
——1934至1945年婺源改隸事件的個案分析

唐立宗

胡春惠、薛化元主編，《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抽印本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二〇〇五年六月出版

省區改劃與省籍情結 ——1934至1945年婺源改隸事件的個案分析

唐立宗^{**}

摘要

1934年為了圍堵贛東北共黨勢力的進展，軍事層峰從閩贛皖浙地圖上，注意到光澤、婺源改隸的必要性，藉由確保江西省界的完整來加強三不管地帶的軍事、政治力量。然而，婺源乃至安徽各地民眾對此卻大感意外，各界接連發起反對婺源劃贛的請願運動。

首次請願風潮是出現於當局決定改隸之際，各大城市的徽商群體進而展開輿援，加速反對運動的進行。第二次風潮是改隸屆滿週年，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倍加困頓，對贛省諸多措施持懷疑態度，正逢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徽籍同鄉團體遂以匪患肅清為由而紛函請願婺源劃回安徽。1939年，當地民眾難以拋開徽州的歷史認同情感，對江西省政府各種措施日復失望，也無法接受「江西人」這個新身分，促發歸皖運動的再產生。抗戰勝利後，婺源各界再次積極發起回皖訴求，並組織「回皖運動委員會」，至1947年婺源才獲得當局的同意重歸安徽管轄。

本文擬就抗戰勝利前1934、1935與1939年三次失敗的婺源回皖請願運動，分析其形成原因、經過與影響，進而嘗試對婺源改隸江西僵持多年的始末提出解答。

* 本文承蒙呂芳上、薛化元教授的指點迷津，特此致謝。也感謝王振忠教授分享閱讀心得，並提供寶貴意見與材料，讓拙文更加充實。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前言

1952年10月24日上午9點30分，司法院院長王寵惠(1881-1958)與另外九位大法官已陸續進入大法官會議廳，他們要討論總共二十二項的決議案件，當討論至第五項議案時，這件由行政院公函聲請解釋省參議員當選之後，「其所從選出之縣改隸他省當選資格，是否繼續有效疑義案」，在場的大法官們實難遽下決定，最後決議此案「予以暫存」，亦即暫不討論、不予解釋。¹事實上，大法官所討論的這件案子，主要是1948年安徽省政府電函內政部，說明江西省婺源縣自劃歸安徽管轄後，主張撤回改選命令與贊成改選者的意見相持不下；加上江西省光澤縣改歸福建隸屬後，原來選出的省參議員郭錫堂為改選事提出再訴願，當時司法院的解釋也前後不一，所以行政院感到相當棘手，接連數次函請司法院速作解釋，深恐將成懸案。²

婺源本隸屬安徽(皖)，但近代的婺源歷經了多次改隸。1934年婺源首次劃歸江西，1947年因地方不斷熱烈展開回皖請願運動而復屬安徽，然又在1949年5月改隸江西。有過類似遭遇的福建光澤縣，亦在1934年劃歸江西，同樣在1947年復歸福建，不過卻從此未再改隸。

中國人向來被視為帶有濃厚的同鄉觀念、省籍情結，當時婺源、光澤兩縣改隸自然會引發不小爭議與影響。特別是婺源縣自唐開元二十八年(740)設置後，長期以來即隸屬徽州所轄，一旦劃歸江西管轄，不僅婺源人無法接受，就連徽州地區各縣人民也激烈反彈，有鑑於此，行政區劃不得不細加思量。因此本文最後會就婺源改隸事件的影響，以現存請願文件、官方文書與報紙等材料嘗試尋求解答，研究斷限止於抗戰勝利以前。至於抗戰勝利後，婺源各界組織「回皖運動委員會」，獲得許多迴響，包括胡適(1891-1962)、楊亮功(1897-1994)等賢達的鼎力支持，但後期的婺源回皖運動牽涉到國大代表選

¹ 〈大法官會議第十一次會議議事錄〉(1952年10月24日紀錄，臺北：國史館館藏司法院檔案)。

² 參見〈據內政部呈婺源縣移轉管轄後該縣參議員應否改選請核示等情請查照併案解釋見復由〉(1948年7月21日發，臺北：國史館館藏司法院檔案)，以及〈關於省參議員選舉疑義之解釋權請迅予解釋由〉(1948年12月18日發，臺北：國史館館藏司法院檔案)。

舉、罷工罷課事件、縮小省區規劃案以及贛皖兩省齟齬的擴大等問題，甚至還發生請願者與地方官員相繼捲入司法訴訟的案外案，皆加深此一事件的複雜性，限於篇幅，冀以另文繼續深掘。

一、婺人的成就與驕傲

婺源現今隸屬於江西省上饒地區，位於贛東北一隅，緊鄰安徽省南部休寧縣、浙江省西北方的開化縣，西邊則與江西景德鎮接壤，形成贛浙皖三省交界的中心區。縣境內多山地和丘陵，尤以縣北各處峰巒起伏為最，西北方的鄣公山麓與東北方的五龍山是眾多河川的源頭，婺源亦因地當發水之源而得名。群山綠水的自然環境，平時氣候雲霧繚繞、雨量充沛，造就了當地適合種植茶葉的優勢條件。自古婺源的綠茶就被列為上品，與祁門的紅茶並稱「祁紅婺綠」。婺源出產的硯臺石材優良，其中龍尾硯與婺墨齊名，素為歷代文人推崇收藏。但自然環境也使得婺源的糧食生產受到制約，顧炎武(1613-1682)在《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二十》就指出包括婺源的徽郡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產至薄，獨宜菽麥蝦稻，不宜稻粱」、「田皆仰高水，故豐年甚少」。於是為求溫飽，不少徽州婺源人習賈經商，在外闖蕩出響亮的名號，其建立的會館多座落在通都大邑，象徵龐大的團結力量與經濟實力。

最讓婺人感到驕傲還在於當地深厚的文化底蘊。自宋代以降，婺源人才輩出，當地即是宋代名儒朱熹(1130-1200)的故里，堪稱全邑之光，即使朱熹出生、講學於福建，但婺人仍認為「朱子，徽產也」，對於朱子為閩人的說法，往昔志書即提出反駁：「執世人矢口之詞，而使先賢失其本根，豈不謬哉！」³據統計，由宋至清，全縣培養約二千多名仕宦，留下一千二百七十五部著作，選入《四庫全書》有一百五十七部，明清時期科舉入仕人數經常名列徽州府榜首。⁴邑人江永(1681-1762)與休寧縣的戴震(1723-1777)同為皖南學派的代表人物，江永集學術之大成，戴震相承而光大，是百年來學術界所公

³ [清]汪正元、[清]吳鶚等纂修，《婺源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680，清光緒八年刊本影印)，卷64〈通志志六·佚事·朱子不得稱閩〉，頁8a-b。

⁴ 齊啟林，〈婺源簡介〉，《婺源文史資料》，1(1986)，頁72。

認的。⁵此外，對天文學與農田水利頗有研究的齊彥槐(1774-1841)、鐵路工程專家的詹天佑(1861-1919)，以及投身近代教育工作的江謙(1876-1942)，其祖籍均為婺源，常為婺人所津津樂道。

雖然當今婺源縣被歸劃於江西上饒地區，但就歷史而言，卻比不過隸屬安徽省徽州地區來得長久。自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始析休寧縣回玉鄉和樂平縣懷金鄉置婺源縣後，婺源即隸屬歙州。有時歙州改為新安郡，不久又復改歙州。至宋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為徽州，元代州改路，明以後路改府。徽州府下轄歙、黟、休寧、績溪、祁門與婺源，婺源還是六縣當中面積最大的一縣。清順治二年(1645)，徽州府屬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屬安徽省，於是婺源縣亦隨之隸屬安徽省，未曾變更。⁶民國廢府留縣，婺源直隸於安徽省，1932年6月，安徽實施首席縣長制，劃全省為十區，婺源則被列入第十行政區內。⁷可說婺源縣千餘年來的行政區劃演變，皆與安徽徽州的關係至為密切。根據語言學者研究，婺源當地所通行的語言仍與江西省內其他地區有顯著不同，江西人稱其為徽語，婺源當地人亦如是稱。⁸

婺源設邑已千百餘年，也難免出現與鄰邑疆界不清的糾紛。歙州山多田少，居民紛紛往南開發，逐漸侵佔至相鄰的饒州樂平縣。唐元和六年(811)，饒、歙兩州互爭婺源縣的丹陽與懷玉鄉，彼此互不相讓，驚動到朝廷派員查勘，最後決定承認歷史現狀，將「婺源縣侵過樂平縣四十五里四十五步，並割屬歙州婺源縣掌管」。⁹從此就確立過往婺源疆界深深地嵌入贛東北地區，而江西省界的不完整性，也就成為日後婺源劃贛的起因之一。

⁵ 楊應芹，〈戴震與江永〉，收入周紹泉、趙華富主編，《'95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頁264-278。

⁶ 葉義銀主編，《婺源縣志》(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頁42-43。

⁷ 陳化奇，〈戰前安徽重要政治設施〉，《安徽政治》，6：9(立煌，1943)，頁6。

⁸ 馬希寧，〈婺源音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頁5。

⁹ 光緒《婺源縣志》，卷2〈疆域志二·沿革〉，頁5a。

二、圍剿與省區改劃——戲劇性改隸的發生

婺源常被比喻為美麗寧靜的鄉村。處處水抱山環，黑瓦粉牆的屋宇點綴期間，比起歐洲田園是不遑多讓的。不過，這樣的景緻到了1929年似乎有些變化。這年3月31日，朱老五率眾過境祁門，4月3日進而圍攻休寧縣屯溪，擄人放火，勢如破竹，立即撼動皖、浙、贛三省。朱老五部眾面對官兵堵截，則轉向婺源進擊，作困獸之鬥。¹⁰而在1929年2月，方志敏(1899-1935)從弋陽領導的紅軍也在贛東北建立起信江蘇維埃根據地，勢力正不斷地急遽擴張，控制遍及閩浙皖贛邊區。¹¹兩股南北交匯的力量，都使得婺源鄉里頗不寧靜。1931年12月17日，婺源縣全境已被攻陷，縣長倉皇逃離，婺源旅休同鄉會、安徽旅滬同鄉會忽聞兵禍蔓延，只得急忙地向各界請願求援。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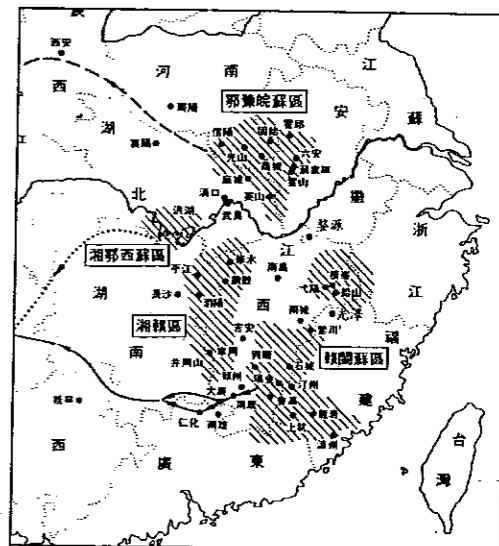


圖1 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頁731，「圍剿與紅軍長征圖(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由此圖可知，光澤、婺源兩縣皆位於各中共蘇區間的重要地帶，正是必須圍堵的缺口，於是光澤、婺源被劃入江西管轄，爾後中共遂向西長征。

為了落實清剿目的，軍委會南昌行營採取圍剿防堵策略，各處設立碉堡，整編保安隊，層層封鎖範圍。擔任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預備軍司令的陳調元(1886-1943)，為此於1934年4

¹⁰ 〈各地新聞：茶葉正忙中，屯溪忽遭匪劫〉，《中央日報》，1929年4月13日，第2張3版；祁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祁門縣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卷24〈軍事·朱老五過境〉，頁549-550；休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休寧縣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卷23〈軍事·朱富潤入休〉，頁414-416。

¹¹ Kamal Shee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8-229.

¹² 〈皖婺源縣被匪攻陷：糜爛全境縣長逃難，旅滬同鄉來京請願〉，《中央日報》，1931年12月20日，第1張2版。

月 18 日率獨立三十三旅進駐婺源，負責協助浙閩贛邊區清鄉善後。¹³至 5 月初，方志敏部隊「地利形勢盡失，無險可憑」，遭到各方大舉包圍，儼然陷入頹勢。¹⁴但多年的「剿匪」經驗，已讓決策者深刻體認到，除非包圍態勢滴水不漏，否則打游擊的「匪軍」部隊終究會漏網。時任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1880-1936)在工作報告中就強調保安團必須打破彼疆此界的紛亂，極力要求各縣團隊統一於行政督察區、省乃至國家。¹⁵陳調元則建議行營將安徽祁門、婺源，浙江開化、遂安，江西浮梁、樂平、德興等縣劃為特別行政區，統隸政治軍事，以利清剿。¹⁶重新建立行政區，勢必將調整原有的組織編制，並且又該如何適當規劃行政區？都是極為困擾的問題。正巧，此時南昌行營收到來自福建光澤地方改隸的請願書，因而圍剿與行政區劃兩案合一的構想隨之提出，不過也連帶影響到婺源的將來。(圖 1)

光澤縣位於福建武夷山北段，方言民情與風俗皆似閩北邵武。但由於地近江西省資溪縣，尤其是該縣十二、十三與二十七都距資溪縣城僅 20 華里(10 公里)，而到光澤縣城卻相距 90 餘華里，於是二十七都圓岱地方民眾代表元愷等 29 人、十二、十三都代表鄧瑞霖等 33 人，以該地糧畜產品多銷往江西之資溪、南城等地，先後呈請所屬各都移轉劃歸江西資溪。是年 5 月下旬，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准其所請，並派江西省民政廳視察張田民會同資溪、光澤兩縣縣長交接。¹⁷6 月 16 日，南昌行營發布治字第七七九一號訓令，緊接著在 6 月 18 日，上海《申報》、南京《中央日報》這天都刊登出南昌行營為便利政治設施、增進清剿效率，而決定將緊鄰江西的安徽婺源縣、福建光澤縣，

¹³ 〈陳調元進駐婺源，防剿皖贛邊區散匪，即將大舉圍剿方股〉，《大公報》，1934年5月2日，9版。

¹⁴ 〈贛東方匪四面被圍〉，《申報》，1934年5月4日，9版；〈浙皖各軍圍剿贛東赤匪〉，《申報》，1934年5月21日，7版。

¹⁵ 〈楊秘書長之工作總評及意見陳述〉，收入《南昌行營召集第二次保安會議記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頁5-8，「1934年6月2日」。

¹⁶ 〈婺源旅外同鄉為請劃婺回皖上國民大會書〉(國民大會秘書處1946年12月7日收，方字第0437號，臺北：國史館藏內政部檔案)。

¹⁷ 黃溥松，〈光澤縣劃歸江西省管轄始末〉，《光澤文史資料》，6(1987)，頁1；相關報導還有〈福建光澤縣廿七、十三、十二等都劃歸資溪縣管轄〉，《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5月30日、〈閩光澤北部劃歸贛資溪〉，《中央日報》，1934年5月31日，第1張3版。

全部劃歸贛省管轄一則報導。¹⁸

婺源歸贛消息甫出，皖人大感意外。劃贛意願是出於閩省光澤縣部分民意，婺源縣民從未有如此表示。再者，《申報》還刊以蔣中正(1887-1975)委員長的名義，函請行政院知照婺源、光澤劃歸贛省的全文，從中可以發現軍事委員會的措置辦法，是先就福建光澤縣地形、緣由作說明，然後才解釋婺源改隸的必要性。¹⁹此皆反映劃贛統轄的種種措施，多起因於光澤民意與福建政局震盪的後續效應。

隨即，行政院在第一六六次會議中通過調整行政區域案，6月24日，決議函送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²⁰同時，江西省政府確定核撥經費，7月3日，省務會議即決定各派幹員三人前往辦理光澤、婺源兩縣接收事宜。²¹4日上午，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正式通過兩縣「為便利剿匪計，劃歸江西省區」等決議案。²²翌日上午，秘書處職員已擬稿致國民政府決議此案通過。²³11日，江西省黨部擬派人員分途前往接收黨務。²⁴

對於婺源這次戲劇性改隸的發生，婺人將矛頭指向率軍駐蹕婺源的陳調元。據說陳調元進入婺源時，城內沿街商戶均清道懸旗、燃炮致敬，熱烈盛況「為婺邑空前所未有」。²⁵陳調元擔任過安徽省主席，蒞駐婺源還曾自行出資千元，開發龍尾硯採石場；他目睹到縣城之北的龍墩名勝荒沒，特派駐兵若干清除垃圾，專為民眾娛樂而開闢球場、建築公園，對婺源貢獻良多。²⁶可是，

¹⁸ 〈婺源光澤兩縣將劃贛管轄〉，《中央日報》，1934年6月18日，第1張2版；〈婺源光澤劃歸贛省管轄〉，《申報》，1934年6月18日，9版。

¹⁹ 〈婺源光澤兩縣劃歸贛省〉，《申報》，1934年6月19日，9版。

²⁰ 〈決議通過將福建省之光澤縣及安徽省之婺源縣劃歸江西省管轄〉(1934年6月26日行政院函送中央政治會議秘書處，收文府字4072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²¹ 〈光澤婺源贛省即接收人員已派定〉，《中央日報》，1934年6月30日，第1張3版；〈光澤婺源兩縣劃歸本省管轄〉、〈第六八五次省務會議〉，均收入《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7月7日，3版。

²² 〈昨中政會議通過本年度國家總概算，光澤婺源兩縣准劃歸贛省管轄，任命李嗣堯毛恩誠為監察委員〉，《中央日報》，1934年7月5日，第1張3版。

²³ 〈閩屬光澤皖屬婺源二縣劃歸江西省案〉(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²⁴ 〈贛黨部接收光澤婺源黨務〉，《中央日報》，1934年7月12日，第1張3版。

²⁵ 〈陳調元進駐婺源防剿皖贛邊區散匪，即將大舉圍剿方股〉，《大公報》，1934年5月2日，9版。

²⁶ 〈陳調元開發婺源龍尾硯石〉，《申報》，1934年5月23日，7版；〈陳調元開闢婺源龍

正由於改隸因剿匪而起，婺源人認為整餉事件均為軍事層峰的一手策劃，最有可能就是陳調元甘冒婺源人之諱，以「便於剿匪」理由，向上峰建議「劃婺源歸贛」，由於主張皆非婺源民意，最終乃被婺源人所否定及痛恨。²⁷

三、力爭到底——反對婺源劃贛請願運動之形成

屋漏連夜雨或能貼切形容 1930 年代婺源人的心境。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婺源綠茶的海外市場突呈劇變，市價傾瀉，就連生產也受到冬雪導致產額蝕收，每擔成本較舊均提高一、二十元，1934 年婺源縣的茶號已減少二十餘家，連帶在上海的茶商貿易一蹶不振。²⁸當報載皖省婺源改隸贛省消息發布後，無疑雪上加霜，更加驚動皖省各縣以及各地徽商團體的注意。

徽商對贛省的反感其來有自：茶商纔在 1932 年就因取道長江運茶，遭到贛省以「九江箱茶徵收產銷稅」名義扣留，雖然商人力辯產地並非贛土，卻仍費時周旋而造成遲滯損失。²⁹徽商擔心若一旦改隸，各埠會館、商賈與數萬婺僑的財產恐將驟析，更會加深其經濟惡化問題，何況鄉里亂事久未平定，此時婺源人正可謂遭受多重打擊。

文教界則憂心改隸後歷史情感的割裂問題。在政府尚未正式決議婺源改隸前，婺源縣的紫陽書院等單位即議論不已，紛表反對。6 月 25 日，徽寧同鄉會、旅滬安徽同鄉會接到婺源紫陽書院等團體的函電，表示婺源與安徽關係較全省任何縣都來得密切，且各省安徽團體組織均以朱子為標榜，一省人文與歷史殊譽是永遠不可磨滅、改變之情形，強調「婺源乃朱子故鄉，今劃婺源歸江西管轄，不啻動搖安徽全省根本」，各同鄉會應對改隸問題據理力

墩勝蹟》，《申報》，1934年7月2日，11版；〈婺源龍墩勝蹟：陳調元派兵開闢整理，風景秀美煥然一新〉，《中央日報》，1934年7月3日，第2張3版等報導。

²⁷ 死中生，〈婺源在哀鳴〉，《徽州日報》，1947年4月4日，3版。

²⁸ 〈皖省茶葉趨勢：海外市場不振，茶市前途悲觀〉，《申報》，1934年6月3日，9版。

²⁹ 〈安徽同鄉會等四團體為婺源劃贛事再發宣言〉，《新聞報》，1934年8月6日，第3張11版；〈安徽旅滬同鄉會常委王竹如等請重付審議將安徽省婺源縣劃歸江西省管轄之案〉（1934年8月20日收文，府字4824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爭。³⁰27日，婺源旅滬同鄉會在源豐潤茶棧召開緊急會議，決議呈函南昌行營委員長蔣中正收回成命，並分向行政院、安徽省府呼籲反對改隸。翌日，婺源旅滬同鄉會將呈文送至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委員，其大意是解釋軍事設施與省區界限應並行不悖，對婺源改隸江西管轄在軍事上究竟有何便利提出疑問。並舉《婺源縣志》的記載，唐代饒歙二州互爭結果，反倒證明人口分布傾向與江西絕無連屬關係。即使府制已取消，但婺源人相信現行的專員督察區域仍屬因地制宜，故徽州六邑的政治區域組合有其必要。³¹

眼見婺源改隸即將拍板定案，甚至婺源當地的《星江報》都刊出支持社論，更讓徽籍同鄉憂心如焚。7月1日婺源旅滬同鄉會再度開會，反對以軍事指揮手段改隸行政管轄，也譴責警告《星江報》的社論荒謬。³²南京的婺源旅京同鄉會特在婺源試館召集緊急會議，共六十餘人出席，亦議決呈請南昌行營蔣中正及行政院收回成命，並表示要定期致祭朱子。³³徽寧旅滬同鄉會則發函稱：「深恐劃歸江西後，不免糾紛疊見，民情難安。」³⁴

至7月5日，旅滬徽商展開同鄉串聯的行動，婺源旅滬、安徽旅滬、徽寧旅滬、徽寧會館四個同鄉團體還舉行記者會，向新聞界報告婺源不能劃入江西的重要理由，也決議推派代表前往南京請願。³⁵7日，上海徽商召開聯席會議，決議趕緊派員向同鄉合肥人段祺瑞(1865-1936)請求援助，組織「婺源改隸問題委員會」，各團體推舉汪伯奇、程霖生(1888-1943)、呂蔭南(?-1957)等十三位委員負責統籌，並致電全國各大都邑安徽同鄉會及各同鄉名流，一致力爭到底。³⁶其中汪伯奇的祖籍亦是婺源，時任上海《新聞報》的總經理，

³⁰ 〈婺人力爭改省問題〉，《申報》，1934年6月26日，10版；〈皖婺源公園電滬同鄉，反對劃歸贛省管轄〉，《新聞報》，1934年6月26日，第3張11版。

³¹ 呈文內容可參見：〈婺源同鄉呈蔣委員長，反對劃婺源歸贛管轄〉，《新聞報》，1934年6月29日，第3張12版。〈安徽旅滬同鄉會代表王竹如等呈請取消將安徽省之婺源縣劃歸江西省免予影響省局及改隸附文〉（1934年6月28日婺源旅滬同鄉會呈中政會議文，收文府字4824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³² 〈婺源同鄉會為改隸事續開會議〉，《新聞報》，1934年7月2日，第4張14版。

³³ 〈婺源同鄉會開緊急會議〉，《中央日報》，1934年7月2日，第3張2版。

³⁴ 〈徽寧旅滬同鄉會續陳婺源不能劃歸江西管轄理由請收回成命〉（1934年7月6日文到，會字第1243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³⁵ 〈旅滬皖團體招待報界〉，《新聞報》，1934年7月6日，第4張14版。

³⁶ 〈皖同鄉會繼續力爭婺源改隸問題〉，《新聞報》，1934年7月8日，第4張15版。

加助反對的力量。³⁷

7月9日，上海的安徽旅滬同鄉會致電政府各部會，提出四項理由：其一，行政區域未可輕更。軍事行動為臨時的，行政措施為永久的；其二，徽屬民情歷史悠久。徽屬各邑同隸已千餘載，均屬黃山山脈，受朱熹學說的薰陶，風尚大致相同，而與江西平野務農、風俗悍鷙者多扞格；其三，剿匪軍事早歸統一。當地駐軍、地方警衛已受軍事委員會調度，並無改隸必要；其四，總理政權主重民意。所以央求府院部會俯察民隱，將該案重付審議。³⁸在上海徽商團體力爭到底的策動下，南昌、江蘇、無錫、休寧、長沙等各地的徽籍同鄉立刻來函表示支持。7月12、13日兩天，徽籍同鄉都曾舉行會議，如討論成立「保婺委員會」，檢討各地請願情形，通過晉京請願案與聯合發表反對婺源劃贛宣言。³⁹7月15日，上海的星江敦梓堂向蔣中正呈文，文云：「對於改隸贛省，不但實際上感受種種不便，即於治安上亦咸惴惴危慮，利害所關，痛癢尤切，爰一致呼籲，懇請收回成命。」⁴⁰浙江的徽籍人士同樣受到旅滬同鄉的號召，全力加入請願運動。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林森(1868-1943)主席收到安徽旅浙同鄉會的電文，該文措詞強烈地要求政府重視民意：「查軍閥之所以敗，敗於違民意，黨國之所以興，興於順民意」，認為「際此省界尚未破除風俗習慣，人情所同，即民意所在」，進而提出政府應該依舊制順民意。⁴¹

7月20日，上海的安徽同鄉會代表王竹如、徽寧同鄉會代表曹志功等人接受各團體委託前往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秘書處請願，他們表示

³⁷ 當時《新聞報》與《申報》堪稱是上海最為暢銷的兩大報，正由於汪伯奇經營《新聞報》，加上《新聞報》重視商界活動，因此徽商的一舉一動，《新聞報》皆翔實報導，且常將徽籍同鄉請願宣言、陳情書全文照刊。

³⁸ 〈皖同鄉電請免劃婺源隸贛並電各地同鄉會請一致力爭〉，《申報》，1934年7月10日，12版。因此7月13日國民黨黨部收到〈安徽旅滬同鄉會請將婺源劃歸江西案重付審議〉(會字第1289號)來文。

³⁹ 〈徽屬六縣同鄉聯席會議，一致力爭婺源劃贛〉，《新聞報》，1934年7月13日，第3張11版；〈旅滬皖同鄉反對婺源劃贛昨訊〉，《新聞報》，1934年7月14日，第4張14版。

⁴⁰ 〈星江敦梓堂呈請收回婺源隸贛成命〉，《新聞報》，1934年7月17日，第4張17版。

⁴¹ 〈安徽旅浙同鄉會電請取消將婺源劃歸江西之議以順民意〉(1934年7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鄉親見到中政會決議，深恐永將定案，殊為不安，要求秘書長將中央意旨作解釋，並遞上〈呈中政會議文〉與書面文稿補充請願意義。⁴²接著，又帶著文稿前往行政院面陳。這份書面報告就軍事、行政與省政等三大方面作概述，說明婺源匪患不及贛東地區，深淺程度大相懸遠；婺屯公路建設，有可能會因改隸出現困難；改隸後學籍懸殊，待遇必見差異，學子求學恐將增加家庭負擔與受長途跋涉之苦；徽饒兩地經濟基礎不同，勉強將婺源隸贛管轄，實則割裂徽州，使婺商頓感貿遷孤危，生計日益艱困；贛多沃土，田賦征收較婺源繁重，若改隸同一省區，納糧將要齊一，婺民可能會增加負擔；婺人訴訟多至徽州歙縣的高等法院，若劃隸江西則勢必將遠赴南昌，造成不便；最後就近年來安徽邊縣動輒改隸，建議為安定人心起見，不可遽行更易。⁴³

對紫陽書院暨各地同鄉會以各種理由先後紛函請免改隸，南昌行營方面的態度表現相當強硬。7月19日，行營即以第三八六六號訓令，要求安徽、福建、江西三省政府分別改劃省界，在主要地點豎立界標。⁴⁴不過政府部會、中央執行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等單位依然收到不少請願陳情，公文轉返頻仍，報章輿論亦經常刊載安徽同鄉的請願宣言，深獲各方關注，就連黨國大老吳稚暉(1865-1953)也曾收集過相關報導。⁴⁵由於請願聲明紛至與外界的輿論壓力，逼使決策當局在堅持立場的同時，不得不正式作公開澄清。7月22日，江西南昌的《民國日報》刊登出南昌行營復以蔣中正名義宣佈〈婺源改隸贛省意旨〉命令全文，行營認為各請願團體所持理由多充滿狹隘見解，對於應行改隸意旨亦缺乏深切體會，因而針對各方意見一一說明，兩天以後，上海的徽商也同樣看到這則新聞。⁴⁶

⁴² 〈安徽旅滬同鄉會為婺源劃歸江西管轄影響省局謹再補敘理由懇請收回成命〉(會字第1333號，文到1934年7月2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陸雲章1934年7月20日便箋」。

⁴³ 亦可參見〈安徽旅滬同鄉會代表王竹如等呈請取消將安徽省之婺源縣劃歸江西省免予影響省局及改隸〉(1934年7月20日，收文府字4273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以及〈旅滬皖同鄉反對婺源劃贛昨訊〉，《新聞報》，1934年7月14日，第4張14版。

⁴⁴ 〈行政院呈國民政府福建邵武縣與江西光澤縣以及安徽休寧縣與江西婺源縣之載定省界圖說〉(1935年10月26日呈送，收文府字7013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⁴⁵ 〈旅滬安徽團體為劃婺源隸贛宣言(五)〉(吳稚暉剪報檔01922，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⁴⁶ 〈蔣委員長行營宣佈婺源改隸贛省意旨〉，《江西民國日報》，1934年7月22日，3版；〈蔣委員長申述婺源改隸意旨〉，《新聞報》，1934年7月24日，第2張7版；〈蔣委員長解

在南昌行營發布的這份約二千餘字的改隸意旨中，首先提出必須改隸理由：在政治方面，婺源地域突入江西境內，不予改隸則不能擴張政治力量；軍事方面，正值剿匪工作緊張之際，改隸後事權屬於一省，撲滅殘匪指日可待；公路方面，婺源通往江西德興兩條公路分屬兩省，運輸管理不易統籌。接著分項駁覆反對理由：如對於習俗懸殊意見，指婺源僅與鄰境休寧、歙縣相同，不能成爲理由；對於徽商經濟問題，以行政區劃與各縣人民團體組織截然兩事回應，且民國建元後，舊徽州府制已經廢除，未聞徽屬六縣會館、資產等分析糾紛，法令亦不強涉其分裂；關於文化問題，朱子乃理學名儒，無論隸屬何省均可景仰師承，皖贛同屬中國版圖，不須懷部落見解，若婺源教育真較江西德興、樂平、浮梁爲優，則根本不必擔心被惡化的問題；歷史關係方面，婺源改隸自有事實需要，不能藉口歷史沿革，而置現實於不顧，更何況民國以來省、市行政區多有變更，不容習故蹈常。文末更批評這些請求文件「多涉空疏，互相發明」，爲此要求婺源縣政府廣事宣傳，詳加勸導，勿執於畛域之見。

當時婺源縣政府的態度如何？時任婺源縣長的劉炎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8月到任，此際卻將成爲安徽省指派的末任「看守縣長」，其立場應該是左右爲難。報載1934年7月8日，皖省主席劉鎮華(1883-1955)致電嘉獎劉炎剿匪有功，南昌行營蔣中正亦給予婺源縣長劉炎記大功一次。⁴⁷不久，江西省主席熊式輝(1893-1974)以劉炎在職甚久，卓著勞績爲由，特電留任。⁴⁸或許，婺源能順利改隸，也是縣長獲獎與留任的考量之一。

儘管南昌行營再次發布改隸意旨，但各方仍請願不斷。例如該年7月24日，《徽聲日報》刊載徽屬旅蕪同鄉呼籲官方不要將婺源劃隸江西管轄。⁴⁹浙

釋婺源改隸意旨》，《申報》，1934年7月25日，9版。

⁴⁷ 〈蔣令嘉獎婺源縣長〉，《新聞報》，1934年6月27日，第2張7版；〈劉鎮華嘉獎婺源縣長，因剿匪得力〉，《中央日報》，1934年7月8日，2張3版。

⁴⁸ 〈婺源劃歸贛省，熊式輝電令劉縣長留任〉，《新聞報》，1934年7月14日，第2張8版。

⁴⁹ 引自王振忠，〈在歷史和地理的邊緣：一九四九年的水嵐村〉，《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2002年5月10日刊登，該文經修改後正式刊載於《華夏人文地理》，9(昆明，2002.6)，惟已刪除關於徽屬旅蕪同鄉記事。

江的旅龍新安同鄉會亦電請當局收回劃贛成命。⁵⁰尤其是上海的徽商團體，因爲「前途利害切身，自難免於緘默」，旅滬各地的徽商表現殊爲搶眼。7月27日，國民黨中政會就接到上海徽屬歙縣、休寧、黟縣、祁門、績溪各地同鄉會的呈文。⁵¹而在8月5日，安徽旅滬同鄉會等四團體又發表第二次聯合宣言，他們認爲蔣中正解釋改隸意旨全文，「願就事論事，原令所示各節，實多研討商確之餘地」，故仍依政治、軍事、公路各項理由回應，再就文化與經濟實質問題申論，已然是針鋒相對，並且將反對婺源改隸訴求提升至「保省運動」。⁵²

8月7日，國民政府收到了安徽旅東同鄉會電報，內文同樣表示旅東婺源人、徽商聽聞改隸而相走驚告，所列反對理由多與其他團體略同。電報中較爲特殊的內容是舉出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平太平天國之亂，在於「平心靜氣，虛己下人，是以東南半壁卒能挽救，曾未聞將某縣、某郡改隸他屬以便於軍事者」；特以蔣中正軍事上最爲尊崇的曾、胡二人爲例，倒是有幾分譏諷之意。⁵³8月27日，新安旅贛同鄉會代表汪澤民等電函國民政府林森主席，認爲剿匪期間，婺源隸皖隸贛皆可不拘泥，但若戰事肅清後仍爲江西管轄，則有呈請收回成命之必要。在電函內並強調由於兩地民風、文化禮教差異過大，婺源劃贛後也將近墨者黑。⁵⁴同時績溪同鄉會也開會決議派員出席「保婺委員會」。⁵⁵

⁵⁰ 見歙縣發行的《徽聲日報》，1934年7月30日記載，引自王振忠，〈徽州旅浙硤石同鄉會與《徽僑月刊》〉，《福建論壇》，2(福州，2001)，頁92-93。

⁵¹ 〈徽屬歙縣旅滬同鄉會等婺源改隸案請重付審議准予更置案〉(1934年7月27日交到，會字第1359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⁵² 〈安徽同鄉會等四團體為婺源劃贛事再發宣言〉，《新聞報》，1934年8月6日，第3張11版、〈安徽旅滬同鄉會常委王竹如等請重付審議將安徽省婺源縣劃歸江西省管轄之案〉(1934年8月20日交到，收文府字4824號)、〈婺源劃歸江西管轄案請重加審議准予改隸〉(1934年8月20日交到，會字第1500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⁵³ 〈安徽旅東同鄉會請重付審查將安徽省婺源縣劃歸江西省管轄之案〉(1934年8月7日交到，收文府字4591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安徽旅東同鄉會請將婺源改隸江西重付審議案〉(1934年8月10日交到，會字第1459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⁵⁴ 〈新安旅贛同鄉會汪澤民等電乞收回將婺源劃歸江西管轄成命以順輿情〉(1934年9月1日交到，收文府字5110號，臺北：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⁵⁵ 〈績溪同鄉會開會記〉，《新聞報》，1934年8月28日，第4張14版。

南京國民政府官員收到這些反對意見，即便是有心解決，但黨政、軍政皆凌駕於上，終究權責有限，未敢任意處置。例如安徽旅滬同鄉會、安徽旅東同鄉會等呈文國民政府反對改隸，國府則依據軍事委員會函覆此案「已據分呈到會，除經批示所請應毋庸議外，函達查照」說明，當下決定文案存查，無再討論之必要。甚至還批文：「請願未合程序。」⁵⁶等於是回應安徽鄉親一個消極且無奈的答案。至9月3日，江西省派任的新縣長陳鑑陽(1896-1957)到任，他是江西湖口縣人，此時舊縣府官員多已離職，前縣長劉炎則轉任安徽省政府移交委員，代表著皖省轄婺的關係正式終止，反對婺源劃贛請願運動面臨到嚴重的挫敗。

四、湧向黨中央——婺源改隸後請願風潮的再起

婺源自1934年秋正式隸贛後，一時之間不論是輿論報導或是各界同鄉職業代表的請願行動，都明顯地減少，如同銷聲匿跡。雖然改隸一週後的9月10日，上海徽籍團體還聯合發表緊要啟事，⁵⁷(圖2)但此後請願聲浪都不若該年6月至8月期間文電絡繹般的熱烈，彷彿就是遭遇重擊下的萎靡不振。

請願屢挫，特別是國府以案經確定而「所請應毋庸議」之消極回答，讓這些徽籍團體深感到與其推派代表盲目莽撞地分向各機關陳請，不如採取更務實的做法，直接找上有權責的主管機構。時值「訓政時期」，一切都由黨領政，



圖2 〈四團體緊要啟事〉，《新聞報》，1934年9月10日，第2張4版。

⁵⁶ 〈安徽旅滬同鄉會常委王竹如等請重付審議將安徽省婺源縣劃歸江西省管轄之案〉(1934年8月21日簽呈，收文府字4824號)。

⁵⁷ 〈四團體緊要啟事〉，《新聞報》，1934年9月10日，第2張4版；該啟事亦收入《力爭婺源管轄案牘彙編》(上海：婺源旅滬同鄉彙編印，1935.11)。

堪稱「黨治時代」，南京國民政府僅是執行機構，必須對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會)負責。而在原來中執會的基礎上，有三個中樞機構，即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常會)、中央政治委員會(中政會)、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委會)；其中中政會實集國家立法、最高決策和人事大權於一體，猶如「太上政府」。⁵⁸因此回顧婺源改隸的決策過程，正是經由南昌行營軍事高層、行政院會議通過後，再送請中執會審議核定，將結果函告國府執行。

徽籍同鄉不僅詳加研討南昌行營頒布的改隸意旨，並仔細推敲政府部門的回應批文。他們認為所謂的「案經確定」一語，當指中央政治會議的核准。徽籍同鄉團體也曾屢次分呈中政會，結果卻是「一律留中不發」，讓他們倍感失望而無奈。於是遍查相關規定，認定除非是向中執會訴願，否則「無論如何熱烈請求，終難收效」。⁵⁹

1934年11月，第五次剿共軍事行動已告結束，國內情勢日趨穩定，中國國民黨乃於該年12月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四屆五中全會)，欲釐定中央與地方權責，並正式決定明年的11月12日將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⁶⁰有鑒於中執會的權責功能，沉寂數月之久的徽籍同鄉馬上展開連署請願，經由旅滬四大同鄉團體的聯合推動，獲得安徽旅鄂、新安六邑旅漢、婺源旅漢、婺源旅京、九江新安會館、蕪湖徽州會館、婺源旅蕪、寧波新安會館、婺源旅省、婺源旅粵、婺源旅邕、婺源旅陝、婺源旅錫、婺源旅蘇等各地同鄉會的連署奧援，可謂盛況再起。請願書內容側重於教育與民生的陳情，陳述婺源全邑學子被摒除徽州固有學區，喪失優良環境，徽幫團體亦將無從獲得政治能力的輔助。他們進而指出：

夫教育為樹人始基，民生為建設首要政治，與民更始，豈容忽視？……

況現在江西匪巢迭經攻陷，婺源暫時又由江西接管，正好依照原定計

⁵⁸ 關於訓政時期的黨治結構與演變，請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150-179。

⁵⁹ 〈安徽同鄉代表向五中全會請願，力爭婺源劃回皖省〉，《新聞報》，1934年12月9日，第3張12版；〈安徽旅滬同鄉會請將婺源劃回安徽管轄案〉(1934年12月，收文書字第17593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⁶⁰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七到七七》(臺北：國史館印行，1995)，頁367、387-388。

劃，責令駐軍限期將境內餘股清剿，而後再使婺源恢復原有管轄，則於功令民意，雙方均能顧全，屬會等對於政府威德，感戴當無涯矣！⁶¹此次徽籍同鄉代表向黨中央的集體請願，果然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1935年1月14日上午11點，秘書狄膺(1895-1964)即將此書面意見呈交主席批閱，以便將來會議席上報告。秘書處並將陳情意見寄往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請示蔣中正對該案之意見。⁶²

婺源劃贛的決策制定究竟是誰促成？是主張圍剿必須打破省界的行營秘書楊永泰？建議設特別行政區乃至被婺源人痛恨的陳調元？抑或是握有最高軍權的蔣中正？答案眾說紛紜。然而徽籍同鄉團體的持續力爭，其中言詞愷切或有時略帶譏諷，倒是產生了反效果。1935年1月31日，南昌行營雖然正式撤銷，但當天蔣氏仍以南昌行營名義快郵回函中政會，這已是南昌行營針對婺源改隸事件的第三次對外聲明。內文提及婺源劃歸江西純粹是爲了「便於剿匪軍事政治起見」，而教育、民生皆包含於政治之中，故徽籍團體所敘理由並不完善。蔣氏認爲婺源才改隸數月，徽幫並無發生散渙情形，且「皖贛邊境零匪尚未肅清，政治設施漸有端緒」，一旦改弦易轍，未免如同兒戲，此案「既經中央備案，俟未便遽言回隸」。蔣氏還針對徽籍同鄉要求收回成命函電，指責都是「舊徽州府屬旅外同鄉會爲最多」，他們既然關懷鄉里，何不返鄉集中人力、財力照顧鄉邦福利，反而又「久持成見，嘵嘵不休」，相信在籍的婺源民眾未必如同。⁶³因此，蔣氏表明拒絕將婺源劃回安徽。

實際上，婺源當地百姓對於家園隸贛規劃亦相當不滿，縣民曾紛紛致電聲援各同鄉團體，改隸當天還透過報端「以表婺民真意」，⁶⁴蔣氏以爲「在籍婺人心理邇時未必如斯」的想法應該是誤解了。然而地方政府似乎也過於枉顧民意，當婺源改隸屆滿一年時，還開會演劇以慶助改隸週年紀念，導致不滿者批評縣府：「卜晝卜夜，粉飾太平，欲令到處啼痕，強爲歡笑，相率爲

⁶¹ 〈安徽同鄉代表向五中全會請願力爭婺源劃回皖省〉，《新聞報》，1934年12月9日，第3張12版；〈安徽旅滬同鄉會請將婺源劃回安徽管轄案〉(1934年12月，收文書字第17593號)。

⁶² 〈安徽旅滬同鄉會請將婺源劃回安徽管轄案〉(1934年12月，收文書字第17593號)。

⁶³ 〈南昌行營復對婺源劃歸江西案意見〉(1935年2月5日，忠字第2066號，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⁶⁴ 〈婺源人對劃贛之電爭〉，《新聞報》，1934年9月4日，第3張15版。

僞，欲蓋彌彰。」⁶⁵1935年9月12日，在歙縣發行的《徽聲日報》第二版刊出〈婺源各界爲「九四」紀念告旅外同鄉書〉，聲言婺源劃贛後政治狀況均較隸皖時「窳敗不堪」，「九四」婺源改隸江西這一天實「婺民一頁痛史也」。⁶⁶

其實國府「所請應毋庸議」的批文，主要是根據軍事委員會的函覆意見，並非中政會的會議結論，徽籍同鄉代表同樣錯解了國府批文。有論者謂，1930年代中政會的職能和地位逐漸由實而虛，蛻變一個沒有實權的榮譽性質執銜，倒是軍權扼控黨政，軍委會的行營和侍從室主宰了一切。⁶⁷婺源劃贛的過程或許就是一個例證，然對於外界而言，他們不必然會洞悉箇中的複雜運作，同鄉代表還是多次地透過向黨中央的陳情途徑，希望能代轉軍政長官以挽回既定決策。

1935年11月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五全大會，堪稱是最高權力機關，此次會議開會前就先召開中執會四屆六中全會，出席中央執監委員達一百一十人，超過以往各次，尤以閻錫山(1883-1960)、馮玉祥(1882-1948)赴會而倍受各界高度的矚目。五全大會召開時，粵、桂等中執會代表亦入京列席，黨中央出現空前未有的團結。⁶⁸在這場象徵「代表全國民意最高會議」當中，大會接連收到多份婺源劃回安徽請願電文，婺源旅滬同鄉會甚至還收集相關案牘，彙編專冊呈交，以示決心。⁶⁹

當然，徽籍請願者是不會放棄向同鄉陳情的機會。馮玉祥曾在1936年8

⁶⁵ 〈皖團體呈五全大會請將婺源仍隸皖屬〉，《新聞報》，1935年11月13日，第3張9版。

⁶⁶ 引自王振忠，〈徽商的一張身份證〉，《中華讀書報》，1999年11月17日。

⁶⁷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頁157-158、167-170。

⁶⁸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七到七七〉，頁387-398。

⁶⁹ 參見〈婺源旅休同鄉會致五全大會代電〉(1935年11月11日，五全處字第44號)、〈婺源旅省同鄉會致五全大會代電〉(1935年11月11日，五全處字第48號)、〈曹志功等上五全大會呈〉(1935年11月11日，附案牘彙編一冊，五全處字第63號)、〈婺源旅景同鄉會張錦明等致五全大會代電〉(1935年11月13日，五全處字第200號)各檔案，現藏於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內文均多強調贛省剿匪軍事已告結束，婺源無改隸必要，且改隸後贛省政府與鄱陽專署鞭長莫及，匪患未息，苛雜未除，民不聊生，還不如仍舊劃回皖省。而1935年11月出版的《力爭婺源管轄案牘彙編》，共包含十餘篇函電與報章相關報導。當時上海報紙亦刊登相關電文，參見：〈皖團體呈六中全會請將婺源仍隸皖屬〉，《新聞報》，1935年11月2日，第4張15-16版、〈皖團體呈五全大會請將婺源仍隸皖屬〉，《新聞報》，1935年11月13日，第3張9版。

月 27 日記載一事，當天中午他在江西廬山接受安徽旅九江同鄉會的邀請共餐，他記下了這次談話：「有匪在婺源，我作軍人真慚愧以對。鄉人養狗、養貓、養雞、養牛，均為有用的，而養軍人作何用？外患的嚴重，內中還有匪患，真是慚愧。」⁷⁰這正表達他對當局某些軍事舉措的不滿，從中亦可推敲徽籍同鄉曾向馮氏勸說婺源返皖之事。因為在當時的環境，透過黨中央的鄉親仗義執言，婺源返皖或許還會有一絲曙光。果然，多年後，身為安徽旅蘇同鄉會理事長的馮玉祥亦聯名向政府要求婺源劃還皖治。⁷¹

五、省籍情結——每下愈況與扞格日深

隨著改隸贛省時間增長，省縣隔閡日深，婺源人歸皖日益心切。究其原因，實存在著濃厚的歷史因素。在清光緒年間，江西人與徽州人已有多次衝突，釀至土客械鬥。⁷²又如根據清末擔任徽州知府劉汝驥的調查，徽州地方「客民以江右為最強，聚眾行兇，流為賊盜者亦復不少」。⁷³在休寧，當地民眾稱江西人為「贛痞」，⁷⁴而地處三省犬牙交錯的婺源，江西民工常備食其間，據調查贛人「性多粗獷，稍不如意，輒嗷嗷忿詈」，反觀「婺人處之淡然」。甚至當婺源船隻行駛到江西樂平縣時，還會遭到堵截要挾。⁷⁵所以徽州人一

⁷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馮玉祥日記》（1936年8月27日），第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784-785。

⁷¹ 〈安徽旅蘇同鄉會致行政院長函〉（1946年11月15日收文，禮京47531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⁷² 承蒙王振忠教授明示，光緒二十一年刊本《新安遊草》卷下即有《後土客歎》，其序文曰：「癸未歲浙西桐、秀之間，土民、客民互相仇殺，……屯溪為皖南一巨鎮，土風敦樸，而江西客民麇集於此，多不法者。比因細故，釀成械鬥。土民之格殺，實客民之尋釁也。爰作《後土客歎》。」

⁷³ [清]劉汝驥，《陶覽公牘》，卷12〈申送六縣民情風俗紳士辦事習慣報告冊文·歙縣民情之習慣·犯罪以何項為最多〉，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10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影印清宣統三年安徽印刷局排印本），頁580。

⁷⁴ [清]劉汝驥，《陶覽公牘》，卷12〈申送六縣民情風俗紳士辦事習慣報告冊文·休寧民情之習慣·交際間之狀況〉，頁587。

⁷⁵ [清]劉汝驥，《陶覽公牘》，卷12〈申送六縣民情風俗紳士辦事習慣報告冊文·婺源民情之習慣·交際間之狀況〉，頁595。

提到江西，就指出該地人士「一味野蠻，不講道理」，「稍一不慎，則起悖違爭鬪之風潮」，這類負面印象大量充斥在清末徽州人的創作小說中。⁷⁶

婺源與贛省間的扞格原因，還可從改隸後當地的民眾生活、社會治安、商業發展與教育環境等方面來觀察。

改隸的這年夏季，全縣苦旱悶熱，驕陽肆虐，導致茶、木兩業極度衰敗，據說是八十年來前所未有，稻田受災面積達三十萬畝，全年糧產頓減百分之四十八。⁷⁷當時就有人認為1934年7月13日夜間天際出現的異象，極可能為旱災的象徵，或是「難星下界」的禍福預兆。⁷⁸天人災異本就殊不可解，但在改隸前後的敏感時刻發生，總會帶來穿鑿附會之說。至1935年3月，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特地召見婺源縣長陳鑑陽詢問災情，陳縣長也向外界報告該縣已有難民食草根樹皮度日的慘狀。⁷⁹1935年6月中旬，婺源晝夜霖雨不休，連綿至6月底的傾盆大雨，邑境四野悉成澤國，是三十年以來未見的水禍，災區損失總數達百萬元以上，現存糧米不足千石。從旱災到水禍，舊損新傷，民間益陷絕境，只能央求省府伸援賑災。⁸⁰

然而婺源民眾對於江西省政府總感到不可信任，如婺白、婺德兩線公路的興築，婺民忍痛捐貨付稅，南昌行營亦體會民生困苦補助六萬元，可是江西省府卻未予補助，當婺邑民眾聽聞庫空如洗的安徽省府還撥款公債二萬元為歙昱道路修築後，兩省舉措優劣立判；另有傳聞提到，婺源代築德興境內的路段已達二十餘里，南昌行營雖批交江西省公路局須撥還婺源六千元，卻遭到贛省拒絕，最後反倒是由行營撥出。⁸¹婺德公路經費的拮据，致使婺源縣政府打算變賣公產，如教育局決議變賣南京試館以撥充興築經費，但此舉更加激怒徽籍同鄉的反彈。⁸²

⁷⁶ 參見王振忠，《徽商小說〈我之小史〉抄稿本二種》，《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34（香港，2004.01），頁9-14。

⁷⁷ 葉義銀主編，《婺源縣志》，頁86。

⁷⁸ 〈婺源天發奇光赤星下隕，見者驚奇莫解〉，《大公報》，1934年7月24日，9版。

⁷⁹ 〈省府熊主席昨召見婺源縣長垂詢該縣政情〉，《江西民國日報》，1935年3月28日，3版。

⁸⁰ 〈婺源水災奇重，村鎮悉成澤國〉，《中央日報》，1935年7月10日，第2張2版。

⁸¹ 查智承，〈婺源輪廬畫（續）〉，《徽州日報》，1947年4月25日，3版。

⁸² 〈婺源同鄉會反對教局變賣南京試館〉，《新聞報》，1935年1月15日，第3張13版。

社會治安方面，表現不如預期，改隸方半載，零星匪徒就出沒於婺源東北的叢山峻嶺。一份陳情電文即指出：「全村被焚燬者，高源山、梅林村之餘燼未息，而邦彥坑、古蜀地之劫焰重燃。」⁸³加上「圍剿部隊，囿於防匪觀念」，任令匪徒憑藉休寧、婺源層巒疊嶂地利潛伏。⁸⁴使得數年後治安更加惡化，婺源匪患遂成爲安徽同鄉與馮玉祥聚餐的話題之一。而婺源境內的清華、太白、沙城、上坦、白陸段、山松、中平、湖村、虹鐘坦、黃沙、閩山、水木坑等處鄉村搶殺迭起，甚至省立徽州師範學校職員在婺源、休寧交界處遭殺害，卻未聞當局有綏靖方案。不禁讓人感到婺源成爲江西邊陲，與休寧、開化接壤地區分屬皖浙贛三省政治不相一貫區域，造成公路停築、電話不通，山深林密的環境遂爲「宵小利用之區」。⁸⁵所以多年後曾有化名爲「虹」的讀者向報社投書說：

婺源僻處贛北，距省寫遠，省政府的督導人員，一年內是很少光臨的。基層政治黑暗異常，「禁政廢弛」、「賭風遍地」，確非言之過甚，所以盜匪在潛滋蔓長，劫奪行旅，時有所聞，何以造成這局面呢？可說是受改隸江西的影響。⁸⁶

地方災情與治安惡化當然會對婺邑商業產生嚴重影響。不少茶樹、木材就因水患衝激流散，而茶號的箱茶運往上海路途亦屢遭劫掠。原本改隸之前，婺源生產的茶葉，多數均由商人購運屯溪改製，然當婺源、屯溪分屬贛皖後，兩省各自爲政，購運維艱，造成商賈相率遷徙，客地商人亦裹足不前，茶農受害匪淺。⁸⁷即使生活困頓、商業衰落不全然是改隸所致，但當局未能妥善解決問題卻是不爭的事實。而改隸以後，銷鹽區域也受到衝擊，據 1941 年 6 月 21 日《徽州日報》報導稱：「江西婺源一縣，雖同屬徽商網銷範圍，

⁸³ 〈婺源旅休同鄉會致五全大會代電〉（1935年11月11日文到，五全處字第44號）。

⁸⁴ 〈曹志功等上五全大會呈〉（1935年11月11日到文，五全處字第63號）。〈皖團體呈六中全會籲請婺源仍歸皖屬〉，《新聞報》，1935年11月2日，第4張15版。

⁸⁵ 〈據汪遜庵等呈請劃婺源歸皖等情請核示由〉（1939年6月5日第三戰區司令部代電，辦字第176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⁸⁶ 虹，〈婺源近貌〉，《徽州日報》，1947年2月18日，3版。

⁸⁷ 〈據汪遜庵等呈請劃婺源歸皖等情請核示由〉（1939年6月5日第三戰區司令部代電，辦字第176號）。

惟值此限銷期間，各縣均有定額，未許通銷，至江西廣信府屬七縣，與徽屬稅率不同，牌價互異，自不能越境衝銷。」⁸⁸稍一不慎，動輒觸法，足以讓徽商、縣民深刻感受省區改劃後的變化，而間接導致鹽區變動所引發的爭議也正不斷地發酵。⁸⁹

教育環境的落後，被邑人視爲朱子故鄉之恥。改隸前婺源各級小學質量與數量皆超過皖屬鄰近各邑，可是改隸贛省後，原有小學即因江西第五區行政專員命令改組爲保立學校，而縣長陳鑑陽亦未能熟悉婺源教育實情，通令所有成績卓著的公私立學校皆不保留，爲的是增設保立學校。重量不重質的結果，遂有人表示各保立學校雖已達二百餘所，中學亦有三所，但「若細考內容，非師資不健全，即經費奇納」，論者即認爲改隸江西正是每下愈況。⁹⁰

長期的歷史因素，加上婺源的生活環境、社會治安、商業發展與教育環境皆不得人心，歷經數年的磨合，地方政務已形同百廢待舉，1938年6月方到任的婺源縣長高楚珩感觸深刻。高楚珩是湖北潛江縣人，與前兩任縣長皆是江西人不同，耐人尋味的是，他還是光澤縣改隸江西所派任的首位縣長，隨後才被指派婺源。光澤、婺源兩縣皆是行政改隸爭議甚鉅的縣份，背後反映當局派任考量不外乎解決省籍糾結與挽救政務廢弛所下的決定。

1939年1月12日，婺源《星江報》開始數日連載婺源縣政府廿八年度（1939）的行政計劃，縣長高楚珩首先提到：

本縣舊本皖屬，改歸贛轄，為時雖已五年；然一考省縣間聯繫之情形，則舍政令之往還外，實難覓得其他表見。事實昭然，不庸為諱！楚珩蒞縣以後，曾深思其致此之因，熟慮其癥結所在，積累月之觀察，始知其所以杆（扞）格未盡融合者，實有多方面之理由……。⁹¹

這正顯示五年以來省縣關係不因時間而有所改善，相反的，矛盾現象確實已複雜難解。而非江西人的高縣長，他觀察到的現象可分四個層面：第一，在

⁸⁸ 〈徽屬網鹽不銷贛發〉，《徽州日報》，1941年6月21日，2版。

⁸⁹ 〈汪行之食鹽走私案，檢察官提公訴〉，《皖報》，1941年10月22日，第3版；〈來函照登〉，《皖報》，1941年11月3日，第3版。

⁹⁰ 〈皖團體呈六中全會籲請婺源仍歸皖屬〉，《新聞報》，1935年11月2日，第4張15版。查智承，〈婺源輪廓畫（續）〉，《徽州日報》，1947年4月25日，3版。

⁹¹ 〈專載：江西省婺源縣政府廿八年度行政計劃〉，《星江報》，1939年1月12日，1版。

歷史方面，婺源本居徽幫商行首腦地位，幾已融入徽州整體無間，雖實質改轄並未拆散民間組合，然觀感上卻已因改轄而削弱切膚情慰。第二，經濟方面，茶葉除了取道屯溪外，資金周流更全借助徽地，江西省以往無經營綠茶出口機關，地方政府亦從未以箇中實情反映，故經濟上均感覺其利害與徽州不可分割，對江西則迄未發生切身痛癢關係。第三，人事方面，婺源人求學十九均出身皖校，服官就業自亦以皖省為便，如今換作他省公職人員蒞縣，隨即失去同鄉奧援，「五年荏苒，終鮮結合」。第四，高縣長指出地方施政問題昧於祇見功令，不見為人民、為地方謀福利之舉動。對於過去地方政府大肆慶祝婺源改轄的做法，高楚珩覺得其政治技巧相當拙劣，每以不必要舉措刺激民眾反感的情緒，當然會影響政令推行。所以他在施政計劃中還表示，「凡屬脫離人民之政治，無論有何偉大之成績，悉屬插瓶之花，經風即敗」！⁹²

當年這份婺源縣政府的年度行政計劃，理應轉交江西省府備案存查，不過此時江西南昌已遭日軍佔領，省會被迫南遷至數百里之遙的泰和縣，婺源與臨時省會的關係更行疏遠。既然省籍嫌隙依舊無法彌合，省縣兩地又相隔甚遠，就連父母官都站在地方民意的立場，可說已搭建出回皖訴求的平臺。

六、婺源歸屬爭奪戰——1939年歸皖請願的開展與挫敗

抗戰爆發後，國民黨中央進行組織調整，1939年初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行中政會的職權，中政會停止了活動，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為戰時黨政軍指揮的最高機構。⁹³至此，徽籍同鄉紛紛轉向其他機關請願。

1939年5月，安徽省皖南行署主任戴戟(1895-1973)，收到由婺源旅漢同鄉會主席孫靜山等四十二人連署的〈呈請劃婺源歸皖〉請願函件，同時婺源旅休同鄉會汪遜庵也以相同書面電呈第三戰區司令部長官顧祝同(1893-1987)，提出剿匪軍事行動已結束，「時異勢變，劃贛主原完全消失」。其內容最特別之處是針對抗戰情勢，說明婺源與皖南呼應不靈，屯溪為皖南行政中心，近

⁹² 〈專載：江西省婺源縣政府廿八年度行政計劃〉，《星江報》，1939年1月12日，1版。

⁹³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114-116。

在咫尺，應該劃歸歸皖，形成江南戰區核心。⁹⁴未幾，安徽省臨時參議會接到全椒縣民汪開棟的請願書，論及「贛省疆域物產較皖省優勝多多，贛不添加婺源，無損本質；皖省若失去婺源，受損太甚」、「倘因軍事上需要，仍須臨時變更者，自可由中央之命是從；若因事實及手續，各機關係難以立時歸還，此係時間問題，歸還之案似可先行核定」。並就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精神，與美蘇各國民治事業論及：「舊區歷史上良好基礎，不輕言廢棄，良有以也。」⁹⁵

關於變更行政區域的大事，第三戰區司令部無法定奪，祇能另將陳請書電呈軍事委員會、桂林行營與皖贛兩省，在程序上，再由軍事委員會將決定付交行政院議決。1939年6月20日，行政院院長孔祥熙(1880-1967)諭令此案移交內政部核議具復。⁹⁶順致電文告知軍委會，已交由內政部處理中。⁹⁷面對這個燙手課題，內政部不敢大意，並咨請江西省政府就婺源改隸後，該縣風俗民情、經濟與贛省鄰縣是否發生隔閡、抗戰軍事有無指揮不便之處提出報告，但久未獲得回音，難以遽下結論。7月12日，行政院秘書處還特地發函催促：「茲為日已久，應請從速核復。」⁹⁸

至9月11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1890-1939)根據請願書與軍委會代電之事，向行政院請示，並另附帶皖南行署呈文、汪開棟請願書等，暗示著安徽省府態度：「婺民所請，似不無理由」。建議婺源宜歸安徽管轄，且若能由皖南行署直接指揮，將更較為便利。⁹⁹安徽省府一反常態的支持婺源歸皖，

⁹⁴ 〈為擬請將婺源劃歸皖省管轄呈請核辦附件——皖南行署原呈〉(1939年5月31日呈轉，收文律字18989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據汪遜庵等呈請劃婺源歸皖等情請核示由〉(1939年6月5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代電，辦字第176號)。

⁹⁵ 〈為擬請將婺源劃歸皖省管轄呈請核辦附件——全椒公民汪開棟請願書〉(1939年8月13日安徽臨時參議會函轉，收文律字18989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⁹⁶ 〈行政院交辦案件通知單：第三戰區司令部代電，轉請將江西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一案〉(1939年6月20日發，律字10054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⁹⁷ 〈汪遜庵等請將婺源劃歸安徽一案情核辦見復〉(1939年6月22日行政院電軍委會，律字10439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⁹⁸ 〈請速核復第三戰區司令部代電請將江西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一案由〉(1939年7月14日行政院發稿，呂字12741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⁹⁹ 〈為奉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電以據婺民呈請劃婺源歸皖一案轉呈鑒核由〉(1939年9月10日收文，律字18703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顯得有些不尋常，然而內政部還在延宕該案未予覆核，所以10月11日行政院再次以速件牋函「擬催該部速復」，¹⁰⁰顯示解決婺源歸皖爭議的急迫性。

10月23日，內政部對婺源歸皖請願案總算有了初步回應。一份由內政部長周鍾嶽(1876-1955)簽呈的意見，認為婺源縣區域凸入江西省轄境內，其東北西面皆為山嶺所環繞，南部與江西省德興、樂平兩縣毗連，且與江西省會南昌相距甚近，交通亦便，若至安徽省會懷寧及皖屬各鄰縣，均需北逾馬金嶺山脈，故依天然形勢及交通狀況而言，以隸江西省為宜。接著指出婺源縣民眾呈列政治、經濟、民情、風俗等項請求，「似無充分理由」。內政部並解釋先前沒有立即核議具復原因，正在於江西省府既未咨復，而第三戰區司令部代電內亦未表示意見，所以「未便擅斷」。該部認為針對抗戰軍事形勢、統一指揮便利上有無劃歸安徽管轄必要，無法提出專業回答，應該還要再徵詢江西省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意見。¹⁰¹當行政院得到內政部的回覆後，立刻就加快作業流程，三天後便央請江西省政府、軍事委員會速查電復。¹⁰²

原先歸皖訴求是期待藉由皖南行署、第三戰區司令部與安徽省府的傳達，使行政院能體察民意，而改變婺源隸屬江西的現狀，卻沒想到行政院最後還是要江西省政府與軍事委員會的意見做裁決。當然江西省府的意見不言可喻，而軍委會的看法短期內也難以撼動，更何況幾年前蔣中正所發布的改隸聲明猶言在耳，可說當內政部提出諮詢江西省府與軍委會的意見時，就注定這次的結果將有最壞的結局。

193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出以委員長蔣中正署名的公函，回覆行政院反對婺源劃回安徽理由：

查婺源縣在平時依天然形勢及交通狀況，以隸江西省為宜。就抗戰形式上，該縣既屬第三戰區地境，其南部復毗連贛屬之德興、樂平兩縣，再南直達浙贛路軍事指揮中心之上饒，於軍事統一指揮上之便利，已

¹⁰⁰ 〈為奉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電以據婺民呈請劃歸皖一案轉呈鑒核由〉(律字18703號速件)。

¹⁰¹ 〈關於第三戰區司令部請將江西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一案〉(內政部1939年10月23日呈行政院文，律字19714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¹⁰² 〈汪遜庵等請將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一案，函請查核見復〉(行政院1939年10月28日發稿，呂字13580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不待言。再〔言〕抗戰行政，須與軍事相輔而行，安徽省政府既北遷立煌，其間長江阻碍，於行政管理上，則遠不如隸屬南移吉安之江西省政府管轄較便利。且無論屬贛、屬皖，均在第三戰區地境之內，故婺源縣無再事紛更、劃歸安徽省管轄之必要。¹⁰³

軍委會的這段說明相當有說服力，顯得抗戰時局下婺源歸皖請求的提出，倒是製造無謂的紛擾。12月11日，行政院院長轉由蔣氏擔任，當天行政院就以院長名義擬稿通知第三戰區司令部、安徽省政府、江西省政府等機關查照軍委會函件。¹⁰⁴十天後，江西省政府也有了動作，一掃過去半年來對婺源歸皖案的相應未理，省主席熊式輝特從泰和發電報聲明：「婺源歸皖管轄案，本府認為仍應屬贛。」¹⁰⁵

江西省府對婺源歸皖管轄案的回應態度值得玩味。先前省府上下對婺源回皖請願態度消極曖昧，認為婺源歸贛已成定案、無庸置疑，另一方面也觀望中央各部會的態度以見機行事。一旦高層下達確切旨意，得到最高軍政首長的背書，省府自然轉為積極確定婺源歸贛管轄權。1940年1月8日，行政院收到江西省府的書面回覆意見，內容均是反駁請願婺源歸皖的理由。例如：(一)政治方面，婺源歸江西管轄後隸屬第五行政督察區，對該縣財政積弊已盡力爬梳，一切建設，如公路、如電話網，均以浮梁為中心，計劃莫不積極興辦，所以1939年該縣自衛隊叛變即速被弭平。(二)軍事方面，婺源山嶺易守難攻，為天然游擊區，「依抗戰全局形勢論，該縣西出浮樂，足以捍衛鄱樂平原，南下玉饒，足以控制浙贛鐵路，正為本省東北屏障」，所謂婺源劃贛使得「三省政治軍事不相一貫」的說法，「殊味分疆劃界之旨」。(三)民俗方面，現今交通器具日臻發達，人事接觸較多，民俗易變，況該縣比起「皖省交通之僅藉肩挑，殊覺靈便」；婺源接境德興、樂平，婚姻人事往來頻繁，不但習俗相近，「即利害之關切，亦未必薄於皖省其他各縣」。(四)生產

¹⁰³ 〈為汪遜庵等請將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一案茲將本會意見函復查照由〉(行政院1939年12月8日收，律字23683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¹⁰⁴ 〈准函軍事委員會函核復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請劃婺源縣歸皖省管轄一案〉(行政院1939年12月14日發稿，呂字16382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¹⁰⁵ 〈熊式輝1939年12月21日電報〉(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方面，省方對浮婺一帶茶葉甚為注意，如設置改良場，廣設毛茶初製工廠，並於集散中心地點設立精製工廠，「為茶農謀取便利，無微不至」；對於省方飽賺茶葉利潤的說法，則指出茶葉輸出皆由中央統籌運銷，「該縣屬贛對其產銷毫無影響」；此外提及婺源產米過少，「均係仰給於樂平、鄱陽等縣，由婺河船運供給，與本省關係尤為密切」。最後說明改隸主要緣由在於婺源地勢突入江西境內甚大，對抱持所謂剿匪軍事結束後理應歸皖的說法表示：「實屬臆測。」¹⁰⁶

有了江西省府具體的說明，於是行政院內負責此案的科長趙恆榮在擬辦意見上，可以理直氣壯向長官反映：「查婺源縣應仍歸江西省管轄，無劃歸安徽省管轄必要。」接著行政院立刻下令各相關機關知照，透過行政命令，再一次澆息請願運動者的熱情。¹⁰⁷

結語——婺源歸皖運動的影響兼論當局婺源劃贛之堅持

由多次婺源歸皖運動的個案過程觀察，可以發現安徽婺源縣改隸的起始，並非當局有計劃的地方行政區劃改造，改隸主要是為了圍堵贛東北共黨勢力的進展，適時福建光澤縣民意改隸呼聲與「閩變」的衝擊，使得軍事高層從閩贛皖浙地圖上，注意到光澤、婺源改隸的必要性，由確保江西省界的完整來加強三不管地帶的軍事、政治力量。

婺源改隸江西後，省方接連派任兩位江西籍的縣長，這個做法雖然強化省府與縣府間的關係，卻使得地方官失去同鄉網絡的支援，其職務安排也讓地方起了反感，省籍情結正隨著日常生活的不愉快體驗持續地醞釀。正因婺源百姓依然認同安徽，所以1942年11月，安徽巢縣人楊亮功擔任皖贛監察使赴婺源各地巡察時，就有這段見聞：「婺源原屬安徽，近年始隸江西，婺

¹⁰⁶ 〈呈復對於第三戰區司令部請將江西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之意見〉(1939年12月21日江西省府發文，泰民字11776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¹⁰⁷ 〈呈復對於第三戰區司令部請將江西婺源劃歸安徽管轄之意見〉(1940年1月8日行政院簽呈，調字647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據呈復婺源縣應仍歸贛省管轄一案意見指令知照由〉(1940年1月12日發稿，調字647號，臺北：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

人不憚於懷，一再訴於政府，今日地方士紳來見，亦以此為言。」¹⁰⁸

婺源長期改隸江西的始末殊為難解，此事主因「剿匪」而制定出行政區劃改變的決策，卻未因「剿匪」告終而恢復從前隸屬，此一爭端中，婺源人相當痛恨陳調元建議劃歸贛的主張。另一方面，軍事高層並未料到婺源、徽商乃至安徽百姓完全不贊成改隸成命，民意反彈聲浪不斷，民間強烈感受地域的政治經濟力量將分崩離析，又認為朱子豈能成為江西人？為此蔣中正還三次澄清改隸的必要性，卻始終得不到安徽鄉里百姓的認同，直至1939年蔣氏還發表「婺源縣無再事紛更、劃歸安徽省管轄之必要」的第四次聲明，中央與地方的隔閡仍持續擴大。

婺源未能返皖，是否亦因高層的省籍情結而影響到決策的最終制定呢？由於整餉事件的發展撲朔迷離，連帶相關事件的巧合也就格外令人猜疑。早自北伐時期，旅滬徽寧同鄉會曾致電蔣，以「徽屬小邑，備受兵災，地脊民貧，供應告竭」為由，冀求北伐軍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戰端。蔣氏則以「所擇途徑，不敢苟同」回覆，並強調：「欲營救鄉邦避免戰禍，莫如加入革命，實行合作。否則惟望轉告徽寧同胞，暫忍一時之短痛，行將解除永久之長痛也。」¹⁰⁹雖然蔣對於徽籍同鄉只顧鄉邦桑梓難以認同，但是安徽人也同樣無法接受蔣自身的省籍偏見，如過去有一段軼聞〈冷雋失言〉云：

蔣公以安徽大學糾紛，撤換校長。安徽耆宿冷雋(冷定菴)，指責其為新軍閥。蔣公激怒，以是對皖人歧視，俟後主皖政者，均不用皖人，自北伐統一，迄大陸淪陷，除吳忠信主政短期外，其餘均為外省籍人。尤以桂系，主政時期最久，安徽幾成為桂系的地盤了。¹¹⁰

特別是從地方行政區劃的角度解讀，都讓安徽同鄉感到一切似乎都是以犧牲安徽為代價：

吾人對於政府改劃意旨，認為不無疑義，未敢苟同，夫吾皖為中國腹心之地，邊鄙都邑，與鄰省犬牙交錯者不一而足，英山割矣，又議婺

¹⁰⁸ 蔣永敬、李雲漢、許師慎編，《楊亮功先生年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280。

¹⁰⁹ 蔣介石，〈復旅滬徽寧同鄉會電——欲自救惟有加入革命〉，收入文砥編，《蔣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頁145-146。

¹¹⁰ 史闡，〈近代名流摭記〉，《皖聲》，9(臺中，1992)，頁72。

源，此而不爭，復著先例，則日後何者入豫？何者入蘇？何者入浙？恐均有所擬議，領域日削，何能與他省共榮並立？¹¹¹

中國人的省籍情結觀念其來有自，自然亦非一二人所獨有。1935年4月12日，王子壯(1901-1948)的日記記載安徽人方希孔告訴他一段秘辛：

方〔希孔〕皖人也，同鄉以劉鎮華主皖以來，政績毫無，省政紊亂，有甚於陳調元時代，爰以京中有職業皖人之集議向中央請願，冀中央注意或予以撤換，議發未久，列名請願者均接首都憲兵司令部之傳票。¹¹²

這場皖人請願撤換皖省主席劉鎮華衍生的風波，或許交雜著對當時省府未表態支持婺源歸皖的不滿，同時也可能投射對劉鎮華並非皖人的情緒。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職業團體請願代表，居然遭到調查約談。王子壯日記還寫道，雖然谷正倫(1890-1953)是接獲武昌行營蔣中正電文：「近有不逞之徒控劉主席，應予押解來漢，實究虛坐。」才有此一行動。但真正的內幕卻是行營秘書長楊永泰與劉鎮華的關係匪淺，故行營方面先發制人以作袒護。王子壯不禁感嘆：「楊何以竟可代蔣發此電報？」他對於楊的「擁蔣毀黨」甚為憂慮，感到今後黨務將難以推動。¹¹³

由上述推論，關於婺源改隸決策與僵持不下，除了軍事考量外，可能還涉及諸多人事因素，而徽籍鄉親多次地向國府機關乃至黨中央請願，要求行營高層收回行政區劃成命的行動，只是一再地刺激決策者，換言之，省籍情結不但困擾著地方，同時也制約著相關決策者的理念，婺源改隸事件就像是擦槍走火的意外狀況，一發不可收拾。

¹¹¹ 〈安徽同鄉會等四團體為婺源劃隸事再發宣言〉，《新聞報》，1934年8月6日，第3張11版。

¹¹²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1935年4月12日)，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90。

¹¹³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1935年4月12日)，第2冊，頁290-293。